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
永州市舜帝文化研究会 资助

王田葵 著

中国伦理的轴心突破

——历史语境中的舜文化

舜文化研究文丛

陈仲庚 蔡建军 主编

国家一级出版社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
永州市舜帝文化研究会 资助

舜文化研究文丛

陈仲庚 蔡建军 主编

中国伦理的轴心突破

——
历史语境中的舜文化

王田葵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伦理的轴心突破——历史语境中的舜文化 / 王田葵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2

(舜文化研究文丛 / 陈仲庚, 蔡建军主编)

ISBN 978-7-5438-7281-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伦理学—研究—中国②舜—文化—研究

IV. ①B82-092 ②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4693 号

出 版 人 : 谢清风

丛书主编 : 陈仲庚 蔡建军

本册著者 : 王田葵

责任编辑 : 肖贵飞

编辑部电话 : 0731-82683328 82683361 82683314

装帧设计 : 罗志义 杨丁丁 肖贵飞

出版发行 :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 410005

营销电话 : 0731-82226732

经 销 :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总 印 张 : 110

总 字 数 : 2 200 000

本册字数 : 200 000

书 号 : ISBN 978-7-5438-7281-3

定 价 : 330.00 元 (全 10 册)

总序

舜文化是 21 世纪以来一个新兴的话题。随着“以德治国”、“和谐社会建设”观念的普及,“舜文化”一词也逐渐成为流行语,因为无论是“以德治国”或是“和谐社会建设”,都需要到舜文化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再加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推动作用,舜文化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关于舜文化研究成果的多少暂且不去说它,仅民间的研究性机构就有湖南的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帝陵基金会、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永州市舜帝文化研究会、宁远县九疑山舜帝文化研究会,山东的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潍坊市大舜文化研究中心、诸城市大舜文化研究会,山西有运城市虞舜文化研究会、永济市舜文化研究会,河南的濮阳市帝舜文化研究会,等等。还有一些虽然没有直接以舜文化命名,但研究内容仍以舜文化为主,如浙江上虞县乡贤研究会。如果把以“舜裔宗亲”命名的联谊会之类的机构也统计在内,那更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如在“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的旗号下,其分支机构遍布海内外几十个国家,总人口达到 1.5 亿——这一切足可说明,舜文化在海内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从上述研究机构的名称中也可以看出,舜、大舜、虞舜、舜帝、帝舜等,其实是一人而多种称呼,“舜”是最简单的称呼。同样,“舜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内涵的指称,也是最简单的。那么,“舜文化”的内涵究竟指什么?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舜文化是以舜帝生平事迹为基础扩充形成的文化体系;其二,舜文化是我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之一,以舜帝为标志,代表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的思想行为和社会风貌;其三,舜文化被孔孟等儒家接受并加以发挥之后,成为儒家文化的主体,以“诚”、“孝”、“仁”、“中”、“和”为核心范畴,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实践途径相结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因此,“舜文化”不是指舜帝一人的“思想”或“文化”,而是作为一个“文化代号”,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民族早期智慧的集中体现。

舜帝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始祖,也是最有研究价值的史前人物。对舜帝与舜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而又十分浩大的工程,归纳起来,主

要有五个方面的研究工作要做：一是文献性研究工作，二是理论性研究工作，三是考据性研究工作，四是普及性研究工作，五是应用性研究工作。

文献性研究工作主要是文献资料的辑录整理，还应包括对民间习俗的调查、民间口头作品和民间文献、民间家谱等征集工作。理论性研究工作应该是舜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复杂，从舜帝其人到其家庭再到其时代，从舜帝思想的形成到其流传再到其演变，从舜文化思想内涵的梳理到其价值评判再到其现代意义的转换……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舜文化仅就思想内容而言就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因而仅理论性研究工作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考据性研究工作主要是考古发掘、发现，以及对新发现文物、文献的辨识和解读。普及性研究工作则是如何让学术性成果走出象牙之塔，让精神性成果深入人心，真正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具体说来，如利用文学、影视、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寓教于乐；让舜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进课堂，对青少年进行民族精神和民族人格的培养，等等，这是一项值得特别重视的工作。应用性研究工作则是将舜文化研究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如舜文化作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如何开发的问题，这同样是一项值得重视的工作。这五项工作只是一个大致的归纳，如要细分起来，舜文化研究的任务则更加复杂而繁重。

舜文化研究的工程是如此浩大，任务是如此繁重，单靠一人之力是无济于事的，仅仅依靠个别单位的力量也是杯水车薪，只有热心此事的全体同仁团结协作，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一项十分浩大而又意义重大的工程。基于这一需要，永州市的同仁在 2003 年发起成立了“永州市舜帝文化研究会”；2007 年，湖南省的同仁发起成立了“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同年，依托湖南科技学院申报建立了“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几年来，湖南省的同仁协作共进，在上述五项工作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在文献性研究工作方面成绩斐然。2009 年 7 月，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帝陵基金会和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三家联合出版了《虞舜大典·古文献卷》，计 220 万字，将先秦至晚清的舜文化相关资料尽数辑录。另外，《虞舜大典·现代文献卷》收录 1911—2010 年一百年的舜文化研究相关资料，现已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的同仁辑录整理完成，约 360 余万字，将于 2011 年由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三家联合出版。

这一套《舜文化研究文丛》，是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与永州市舜帝文化研究会几位同仁集体合作的成果。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理论性研究，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角度，相互配合则形成了一个整体，将湖南省的舜文化

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以前的各自为战，开始形成协作共进的团队力量。这套著作，是几位同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学术积累的结果，也是学术志趣相同的不同年龄、不同专业的同仁多年自愿组合的学术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团队之所以二十几年不间断，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学术传统：在相互驳正、相互交流的融洽气氛中，形成了信息资源共享、“问题意识”互补，友朋切磋、师承授受的传统。这个传统再加上著作者读书不倦的踏实作风，是这套丛书得以问世的重要保证。丛书的著作者，有的泛观群书以博其趣，重于经而本于史，搜汇前人之说，把握学术兴替脉络和特点，理论、体用兼顾，务求稳健；有的重视躬行实践，服务当代，又不盲目跟风；有的关注方志地域对舜文化的影响，重视地方文化资源的开掘和梳理……总之，丛书的著作者都是有感而发，有思而作，既不唯古是从，也不唯洋是趋。应该说，每一部著作都是有所创获、各具特点的。有些成果是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征求同仁的意见后形成的见解，如王田葵教授关于舜文化的七条基本认识就是如此。这七条认识与《黄帝文化志》所发表的关于黄帝文化的八条认识相呼应，可以说是几年来寻根问祖研究远古文化的新收获。有些前期成果已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如张京华教授关于“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论问题”即“顾颉刚难题”的文章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发表后，李学勤教授在《黄帝文化志》的序言中作了详细引用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田葵教授的《论孔子“道德金律”之逆定律之不可推》在《孔子研究》2003年第4期发表后，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二人还在2010年上半年先后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作了相关的学术讲座，可以说将舜文化研究的普及性工作带到了香港及海外，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既然是一部丛书，著作者不同，其学术水准定然有差异，其用功力度定然有区别，有的因工作繁忙，匆遽成书，难免有撰述之疏。但我要强调的是，在这里不存在功利目的，每一部著作都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凝结，是对舜文化研究的真兴趣、真爱好的体现，在当今功利盛行、学术浮躁的背景下，能够葆有这种“真情”已是弥足珍贵。至于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就不妄加论评了，聊作引玉之砖，希望能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注意，能引来同仁们的批评指教，尤其是希望能引来更多的美玉。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陈仲庚谨识

二〇一一年元旦

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

湖南科技学院王田葵教授与我相识多年，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虞舜文化研究，成就彰著。近日，新作《中国伦理的轴心突破——历史语境中的舜文化》一书即将出版，谨以《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一文代序。

1973年末，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大量帛书，这是中国考古学声闻世界的一件大事。我虽然在1974年参加了整理帛书的一些工作，但由于“文革”运动的限制，次年初才去整理小组报到。到了那里，一开始就看见已经复原的两幅古地图。最使我惊奇不已的，是在其中《地形图》九疑山的旁边，竟标注着“帝舜”二字。

看到这幅西汉早年的地图，九疑山的位置和形状相当准确。山的南侧画有一处建筑，由九条柱形构成，中间有高度不等的尖顶。谭其骧先生根据《水经·湘水注》九疑“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的记载，认为“这座建筑物当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舜死在苍梧，葬于九疑，无疑是古老的传说，可是舜庙能有这么早吗？我心里一直在怀疑着。

2004年，也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日，我应邀前往位于宁远县城东南的玉琯岩建筑遗址参观考察。经历了重重峰峦，进入遗址所在的山间盆地，九疑诸峰秀色，尽收眼底，气象恢宏万千，使人对先民选址的精当不禁叹服。

我仔细观察了正在发掘的部分遗址以及出土的陶瓷、砖瓦等器物，获知遗址上部年代是北宋，与史籍记载宋初敕修九疑山舜庙相合。从已开掘的部分看，当时舜庙规模相当宏大。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北宋遗存之下，还有更早的建筑地层。特别是如发掘者指出的，“在发掘区下部堆积中发现了汉代祭祀坑和不晚于东汉早期的大型建筑遗迹。”（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61页）这就和马王堆帛书古地图的舜庙有可能联系上了。

舜庙历史的绵远，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背景的。

作为《二十四史》首部的《史记》，司马迁在夏、殷（商）、周三代本纪之前，专列了《五帝本纪》，五帝是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颛顼、帝喾后来不那么重要，甚至很少提起，黄帝和尧、舜则是人所共知。造成这种差别的

理由是明显的。黄帝被尊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各种文明因素从他那时代创始,因而号称“人文初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表中国文明的起源。至于尧、舜的时代,文明已经形成光大,尤其在儒家心目中,是理想的“黄金时期”。孔子便说过:“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巍乎其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传统的经籍《尚书》,起首是《尧典》和《舜典》。这两篇在古时本来是一篇,就叫《尧典》,也有时称《帝典》。据说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尧、舜,不取有关更早时代的材料,是寓有以尧、舜为治世的深意的。著名的《礼运篇》所描写的大同在禹、汤、文、武、成天、周公之前,同样是以尧、舜为治世的极致。这样,尧、舜在传统文化中,便成为理想的圣王明君了。

《尧典》以及其他有关文献所记载的舜是一个出身民间的人才的典型。他以贤德孝行著称,得到帝尧的选拔,通过危难政事等等考验,成为尧的重要辅佐。最后,尧不但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还让他做了帝位的继承人,完成了名垂后世的“禅让”。这些事迹,显然与儒家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相结合的理想一致。许多古书对尧、舜的传说作了发挥。近年发现的战国时期佚书竹简,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竹简《容成氏》,不仅以很多的文句铺陈尧、舜的事迹,甚至说自远古容成氏以来,其有天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尧能让贤,“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者”,把尧、舜禅让无限夸大了。

怎样看待尧、舜以及禹这一类古史传说,在史学界历来有争论。晚清以下疑古思潮的学者主张尧、舜、禹都是神话,系后人所伪托。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如王国维便说:“疑古之过,乃併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处理也。”(《古史新证》,第2页)他专门提出青铜器铭文中关于禹的记载,作为证明,但没能列举关于尧、舜的较早材料,所举青铜器也较晚,是春秋中晚期的。2002年,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其铭文讲到禹的治水,文句同于《尚书·禹贡》和《禹贡》的序,与《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也很近似。看这些文献,可知治水一事和尧、舜是分不开的。古史传说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还是王国维先生说得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古史新证》,第1页)古史传说是古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能像后代史料那样直接引据,也不应因混有神话而全盘抹杀。

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例如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限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陶寺发

现了面积达 280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其中有结构复杂的建筑基础，有规模颇大的贵族墓葬，出土了玉器、铜器及陶制的礼乐器等，还出现了文字。最近发掘的一处特殊建筑基址，有学者推测与“观象授时”可能有关，而后者正是《尧典》的一项内容。大家知道，陶寺的地理位置同文献中“尧都平阳”正好接近。由此看来，认为传说中尧、舜时代文明业已初步建立是妥当的。

总之，九疑山舜庙之所以源远流长，并非偶然。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历史的绵延悠久，后世对先代的仰溯追忆；另一方面也寄托着传统文化关于盛时治世的期待和理想。希望玉琯岩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李学勤

2008 年 9 月于北京清华园荷清苑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舜帝与中华道德统绪 /011

- 一、三皇五帝时代：中国古代文明 /011
- 二、舜帝与德治 /022

第二章 舜帝葬所与舜帝陵庙 /031

- 一、舜帝陵与舜帝庙 /031
- 二、舜葬九疑 /042

第三章 舜帝陵祭祀与舜德传承 /050

- 一、舜帝陵祭祀 /050
- 二、舜德传承 /056

第四章 舜帝与礼乐文明 /060

- 一、礼乐文化的反思与转型 /060
- 二、礼乐的现代模板 /072

第五章 舜文化与“轴心突破” /083

- 一、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文化背景 /083
- 二、舜文化与“轴心突破” /097

第六章 舜文化的阐释与演进 /103

- 一、祖述尧舜 /103
- 二、传圣贤一脉 /116
- 三、现代性的阐释 /126

第七章 舜文化留在一座古城的记忆 /136

一、沿革与地位 /136

二、名人与经济 /148

后 记 /167

002

前言

“舜文化”概念提出及其内涵界定，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这一概念肇始于司马迁“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一名言。“明德”二字彰显了“舜文化”的基本内涵。199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将军正式提出了“舜文化”的概念。这一年，萧克将军向秦光荣、周建达同志建议在宁远成立九疑山舜文化研究会，开展舜文化研究，并明确提出要弘扬舜帝“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精神。

1998年之后，宁远县县长李德勋先后发表了《舜文化初探》、《舜文化与儒家文化》等文章。参与这些成果研究的有张介立，周九疑等学者。这两篇文章从舜文化概念内涵及现实意义方面作了专门论述，指出舜文化是道德文化的集合，包括伦理、社会、职业、政治道德，是中华道德文化之源。此可谓我国舜文化概念的发端之论。值得指出的是，自2003年4月起，中国先秦史学会部分专家对山西运城地区作了三次考察。在此基础上，于2004年9月27日，“中国先秦史学会尧舜禹研究基地”在鸣条舜帝陵庙正式挂牌。2005年9月5日至7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共运城市盐湖区委、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在运城隆重举行。大会共收到106篇论文，就中华道德文明的源流、地域特征、旅游开发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85篇连同2004年“虞舜文化专家座谈会”收到的15篇论文于2005年以《虞舜文化研究集》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山西学者通过学术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表明舜帝出生、成长、建都、休养、卒葬均在今运城境内”。^[1]这种以学术为祖先“争户口”的做法既不科学，亦与

[1] 于波. 前言 [A]. 虞舜文化研究集 [C].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P2

弘扬舜德的宗旨相悖。尽管如此，就学术而言，这一百余篇论文的大部分反映了虞舜文化研究的新拓展。接着，笔者在《论舜文化特征与舜帝精神》一文中，将道德内涵确定为人伦、职业、社会、宇宙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于2005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更为准确地将舜文化质的规定性（个性）确定为“三重道德体系”：即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并指出舜文化是中华道德文化之源。同时给舜文化下了一个定义：舜文化是以舜帝明德为内涵的文化。这一定义涵盖了这一概念中的本质属性，其中有：舜帝开创并践履的道德；虞舜是道德圣人；这种道德称循道而有所“得”（帝王官员内得于己，外得于人，行德治，人民得平安、幸福）。可见这个道德涵盖了德性、德行、德治的内涵。总之，政治文化是舜文化最基本的性质。^[1]

争论虞舜之有无或历史元典之真伪和发表时间是史学家们的事。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化现象，重要的不在于它是否被证明为真实或何种程度上被证明为真实，而在于它已经被中国历史所不断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舜文化是被历史阐释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文化研究其实是历史阐释的研究。当舜帝明德进入中华文明史的叙述时，舜德才成了文化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舜文化的研究是对舜德阐释史的研究。然而，我们的研究又是为现在和未来的研究。这是现实交付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明白，责任要求我们去追溯历史，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更好地去认识现实和未来。我们的任务是：分疏出舜创道德文化基质里哪些是糟粕的东西，哪些是精华的东西；这些东西如何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哪些东西对现代化社会建设带来阻遏，哪些东西是现代化社会建设的资源。认识这些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鲜明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虽然，历史和现实总是紧密相连的，而且现状通常是切入点，但研究的侧重点应该是在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

研究的发现是在深厚的学术基础上的发现，而不是浮光掠影和随波逐流的发现。

二

有人认为既然舜文化的核心内容与儒家文化有密切关联，为什么还要提出舜文化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种意见认为儒家文化已包含了舜文化。但我认为舜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主观的、人为的，而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时代要求。改革开放时代需要提出炎黄文化，舜文化与炎黄文化一样是以上古英雄为

[1] 王田葵，何红斌. 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P1、P114

阐释对象的文化。舜文化与炎黄文化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比较而言,在五帝之中,舜帝明德是先秦经史王官之学与诸子百家典籍中出现频率最高、覆盖面相当广的文化现象。就以舜帝陵、庙、祠为例,据万里先生查证,“在几乎囊括了最基本之历史文献的整套《四库全书》中,有 88 次提到舜陵,419 次提到舜庙,303 次提到舜祠,当然,其中有一些重复的内容。”^[1]舜帝在《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等著作中,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古代帝王之一。就《孟子》而言,提到《尧典》1 次,提到黄帝 0 次,尧帝 58 次,舜帝 97 次。由此可见,舜文化是中华道德文化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20 世纪末期,跨国资本挟夹西方政治文化席卷全球,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时成了世界热门话题。全球化与不同文明属系的相互对抗与相互融合同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正面临着转型性的巨大变化。学术界对旧有的阐释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发现另外一个世界的思想会使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有更多的发现。中国学人开始考虑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中国文明能对世界多样文明和谐共存提供普世价值吗?西方的文化思想能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和批判性重建提供价值资源吗?经历过 20 世纪末的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对话”和“交流”,固本与豁蒙的双向互动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不是要放弃中国文化之根脉而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学术范畴,也不是把西方的真理、理性、启蒙、法制精神拒于国门之外,而是要找寻中国文化转型性创造之路。这条文化思想之路应是能适应全球化大背景,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理性价值之路。这是提出舜文化概念的真正动机。

人们在谈到中华文化时已经不满足新儒家的表述了。即便是对儒家文化的阐释,也必须突破新儒家的视域。

笔者所说的舜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舜文化不仅涵盖了以舜德精神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而且涵盖了道、法、墨以及后来的佛学诸多文化要素。它们对舜文化的阐发和传承作出过贡献。为了界定舜文化概念,笔者曾经在《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舜文化学科理论形态的三个维度”,指出舜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原生性、正统性和伦理性。

其一,舜文化作为赋予古国社会独特本质的那些文明因素的集合体,是先经过经史王官之学,后经历轴心突破的诸子百家的记载、阐释而保存下来,并深深融入中华文化血脉之中的。舜文化的原生性特征决定它是多元和合文化;其二,

[1] 万里. 关于舜帝归葬地的考察[A]. 舜文化论文集(第一辑)[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P69

舜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不仅仅是影响关系,而是发生学关系。这是因为舜文化具有正统性特点。舜帝的“明德”为孔孟诸儒提供了又“述”又“作”的实践理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舜文化是儒家根脉文化,儒学是舜帝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三,舜文化是把道德作为先验的、自足的本体。它与其他文化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就在于,人的价值是由内在超越的路径来实现的。舜文化、儒家文化讲的道德本体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对社会道德原则的理论概括,人与本体是同一的,人的价值的完善与社会本身的完善也是同一的。这是一种内在超越方式的价值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舜文化又是道德本体文化。

三

舜文化研究常常给人多而杂的印象,应该作出一些合理的界定。

其一,舜文化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质。舜文化博大精深,从广度上看,百姓日用、天人合一皆在其域;从深度看,东西哲思、理一分殊皆在其里。它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这个“一”有如“道”,它是“体”;这个“多”像是“有”,它是“用”。舜文化研究起来的确很复杂,但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中国文明史上早期一位帝王所演绎出来的政治伦理文化。舜文化的道德是广义道德,亦即政治、法律、道德(狭义)三位一体的道德。这种广义道德是由上古五帝之一的虞舜大帝创造并践履的。舜帝是这种道德文化的原创者,离开了舜帝来研究文化就不是舜文化了。但这种原创性是经史王官之学和诸子百家记载和阐释的结果,没有这种记载和阐释,舜文化不可能存在。这是因为虞舜时代还没有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讲,舜文化是被阐释的道德文化。由此,舜文化的研究就不只是单一的人文学科研究,须借助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民族学、伦理学、神话学、文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知识来进行综合研究。这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

其二,宏观地研究中华道德文明中虞帝一人与道德一脉的相关联性,道德的传承和现代转化的相关联性,就是舜文化研究的学术个性。舜文化研究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并不是漫无边界的研究。它的边界应当是它的学科个性。

这里自然牵扯到学科名称问题。学科名称是为学科分类的“立法”性命名,事关重大,不能视同儿戏。然而,社会在不断发展,学科命名总是落后于时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即中国历史早期的一段,从李济、张光直到李学勤先生,都主张有专门的学科名称。张光直先生称“先秦史”,曹兵武博士则认为需要用新眼光,建构一个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形成为对象的新学科,他称之为“中国文明史”。李学勤先生则认为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或

许更贴切些。^[1] 李学勤先生的卓见若能得到批准定将有助于学术之精进。

以此为参照，舜文化研究的界定就必须是两个方面的：从道德的创造和践履来研究“虞帝一人”，它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这一学科范围之内（此学科未获批准前暂属于历史学）；而以“道德一脉”而论，它在“哲学”范围之内。

其三，舜文化研究个性的自足存在，是舜文化研究的价值和优势。舜文化研究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虽然给研究者带来了学术困难，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我国从传统道德转化成现代道德，以及理论的扩展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舜文化的内涵散落于典籍之中，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当然也未被列为独立的学科。将舜文化单独提出来有利于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明德”，即研究其肇始的诸层面及传承的全过程的理论体系。我曾将这种研究上的优势概括为一轴、两翼、三视域：“一轴”，就是比较充分地考察舜创道德的历史内涵和演变。“两翼”，就是固本与豁蒙。“固”中华道德文化精华之“本”，“豁”现代精神之“蒙”。具体而言，就是对舜德滥觞的中华道德文化流程的研究，既有利于比较舜文化与其他文化个体之间的差异与相互关系，又有利于看清舜创道德文化内部的特点，尤其是有利于看清舜创道德文化传统对现代价值观形成的作用，还有利于将传统研究与现代社会道德建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舜创道德文化具有“三视域”：人与自然（宇宙道德）、人与人（社会道德、人伦道德）、人的身心（指上述三重道德上的超越追求）。

中国思想史上，道德就是将政治制度、人伦道德、宇宙自然相互融合构成为一个道德体系，自然—社会—人伦三位一体的道德体系。李泽厚说：“孔孟荀的共同处是，充分注意了作为群体的人类社会的秩序规范（外）与作为个体人性的主观心理结构（内）相互适应这个重大问题，也即是所谓人性论问题。他们的差异处是，孔子只提出仁学的文化心理结构，孟子发展了这个结构中的心理和个体人格价值的方面，它由内而外。荀子则强调发挥了治国平天下的群体秩序规范的方面，亦即强调阐释‘礼’作为准绳尺度的方面，它由外而内。”^[2] 无论是主张由内而外，还是主张由外而内，都没有超越这个三位一体的道德结构。这一自足的稳定体系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而引发了宋明理学的兴盛，二程和朱子之理学发展了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人性与道德的连续性思维。陆王“心学”将“心”看成宇宙万物之本原，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的命题。仔细观察，舜创道德演绎到现代，其实都是对上述三个视域的演绎。

[1] 李学勤.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P13

[2]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P109

四

舜文化研究有两个难点：舜帝其人与道德形而上学。

对于上古史的表述，笔者是非常谨慎的。笔者以为，舜帝是中华文明童年时代历史与神话传说融合的标志性人物，上古帝王圣人之一。笔者以《唐虞之道》、《容成氏》、《马王堆帛书地图》等考古材料为基础，又充分关注舜帝神话传说的史实“素地”，将考古与文献对照起来分析，充分发掘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权威成果，下笔力求全面、科学和稳健。我尤其时常提醒自己，与时下一些争夺文化资源的地方性浪漫想象的舜文化“研究”保持一定距离。

如上所述，舜文化归趋于人性根源是逻辑的必然。自孟子倡导人性本善之说后，“性”的善恶就成为任何人性哲学绕不开的一大课题。本书认为这些争论归于对“性”所指不明确，对善恶的涵义与标准未加分清。这种语言逻辑的混乱不清导致性善论与性恶论成为没完没了的争论。

宋明理学追求本源之性必以孟子为归趋。孟子以溯源立本的思想态度和方法，发现了“善”的意义：善是出自人的本源之性的意念与行为。从而印证所谓“四端”的本源性。宋明诸儒由此发展为“本源形而上学”与“本源人性论”。

20世纪80、90年代的学人掀起的理学“文化热”，笔者深知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他们不去关注宋明新儒家的政治诉求，却转向“形而上”与“形而下”，目的在于淡忘“形而中”。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理论性、系统性，而对现实性、直接性较少关注。结果很显然，他们用心阐发的“主静”、“窒欲”、“义理”，不管如何精致，也不可能实现“人是目的”，只有“和女士”（humanrights，人权）能够达成人的这一最高本质。这两个方面的区别就在于能否激活人性中的道德原动力。离开个人自由、法制、市场经济和个人财产权来谈心性之学，“先内圣后外王”，能促进真正的政治文化建构吗？民主是个好东西，制度不成全没戏。务实的日本人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悟到了中国道学的空谈性弱点。这种空泛的义理在近世日本思想界，尤其是“古学派”中得到了与中国学派完全不同的建构性解读。“古学派”的重要人物荻生徂徕（1666—1728）认为，礼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不需要议论却可以解决任何议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不需要刑杀却可以发挥任何刑杀所难以发挥的作用；不是“性善论”，却能发挥“性善论”所无法企及的“劝善”功能；寓道德于无声，成德行于仪式。徂徕的“以外化内”道德达成路径，通过长期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他们有感于外在礼仪的缺失和人性与道德的异质特点，认为

[1] 荻生徂徕·辨明[A]. 荻生徂徕[C]. 日本思想大系(36). 东京：岩波书店，1973，P215